

军事电影的当代风貌:

沙场上的正义与情义

■ 齐伟

银幕亮起,硝烟弥漫、铁流奔涌,号角声里涌动着炽热的激情……近年来,中国军事题材电影总能以独特的震撼力牵动人心,让观众在紧张与激昂中感受勇气与信念的交织。影片既在银幕上还原战场枪林弹雨,也用光影奏响“强军战歌”,彰显着新的文艺精神气象与力量。

在此般精神气象中,军事题材电影正逐渐展现出不同以往的风貌,这既关乎创作内核的革新,亦凸显价值表达的延伸。“新”与“进”,正是理解当下军事题材电影高质量发展的两个关键维度。

内核之“新”:于宏大叙事中见人文关怀

新中国成立之初,军事题材电影构成了共和国银幕的底色与风骨。《董存瑞》《上甘岭》《红色娘子军》《英雄儿女》等经典影片,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为创作背景,开创了书写民族解放与英雄史诗的中国式战争叙事。随着战争远去与社会转型,镜头从重大历史逐步转向军旅日常,《哥俩好》《炮兵少校》《海之魂》等作品以轻快风格展现了更生活化的面向。

近年来,《红海行动》等佳作实现由“战争叙事”向“类型叙事+工业美学”的跃迁。由此,军事题材电影把主流价值观和商业类型片的叙事方式、工业水准结合起来,既能打动观众情感,又能满足市场娱乐需求,使其找到了新的活力与表达空间。

相较而言,以往的军事题材电影,在宏大叙事中因着重政治符号与“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而稍显与观众情感世界的疏离。近年来军事题材电影在坚守重大历史骨架的同时,注入饱满的人文关怀,将冷峻的战争史诗转化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动人故事。这种转变,最显著地体现在英雄的“人性化”塑造上,呈现出有脆弱、有挣扎、有情感牵绊的“可感的人”。

譬如《长津湖》不仅呈现了志愿军战士在长津湖战役中英勇无畏,更深入挖掘了伍千里、伍万里兄弟之间浓烈炽热的亲情,以及战士们对家国故土的深切思念。这种细腻的情感



《红海行动》剧照。

描摹,让观众从残酷的战争场面中抽离出来去体悟英雄作为普通人所承受的内心煎熬与坚持,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情感距离。再如《万里归途》,在“撤侨”的叙事主线中,通过外交官宗大伟和白嫫等人物视角,聚焦普通华人的焦虑、恐惧以及对祖国的期盼,构成叙事中最为动人的情感共鸣点,使家国情怀具象为无数鲜活的个人命运。

正是这种在宏大叙事中观照个体命运,注入人文关怀的创作方式,使近年来军事题材电影更具共鸣与共情力度。内核之“新”,使观众从看见与感受“战争场景”到理解“何以作战”,让电影在保有史诗感的同时,更具温度与厚度。进而言之,和平年代的军事题材电影早已不止于再现战争场面,而是不断探索如何凝聚价值与激发意志,使光影铸就的“强军战歌”久久回响于银幕内外。

表达之“进”:从保家卫国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说内核之“新”是近年来军事题材电影向内挖掘;那么表达之“进”,则是向外开拓,在叙事格局与价值坐标中实现跃升——由“保家卫国”的主题延伸至更为宏阔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在世界银幕上展现大国担当。

这一进阶的起点,是叙事空间的“破壁”与行动逻辑重塑。传统军事题材电影的核心情节往往围绕“御敌于国门之外”展开。近年的影像表达,则将镜头转向海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定义“战”与“守”的内涵。《红海行动》改编自“也门撤侨”真实事件,讲述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执行撤侨任务,并挫败恐怖分子首领阴谋的故事。

镜头跨出国境,不是单纯的场景切换,而是大国责任边界的延伸——叙事从“领土安全”升级为“人类安全”,把“守护”的对象从疆土与权利,拓展到生命、秩序与尊严。同时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对“家”的守护,已延展至每一个海外同胞的安危,“国”的形象,也在全球性的挑战与危机中被淬炼与重塑。

影像表达之“进”,也体现在主角的形象与身份更加多元。主角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作战主体”,而是承担撤侨、维和、人道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以及国际公共安全职责的复合型行动者,如外交官、医疗救援队、护航编队等。他们不仅要直面火线,还要在多边博弈与跨文化沟通中调停、化解危机。如《万里归途》的外交官通过谈判、开辟行走走廊,护送撤离车队,将“力量”从武力转化为制度与协作的效



《长津湖》剧照。

力。影片中,“撤离车队与难民队伍并行”的镜头进一步强调了“生命至上、众生平等”的伦理秩序,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象化。

“新”与“进”的交织,共同构成近年军事题材电影跨越式发展的鲜明特征。“新”在从宏大叙事到人文关怀的深刻转型,赋予战斗和英雄形象更为真实感人的情感维度;“进”则体现为主动担当国际责任的全球视野与价值表达。

然而,为充分发挥新趋势的潜力,军事题材电影创作仍需在几个关键领域进一步深化:其一,电影应更加鲜明地彰显价值引领作用,以文化自信和深厚的社会责任感,生动诠释中国军人的使命与担当;其二,艺术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平衡至关重要,创作者需要在确保叙事真实可信的同时,保有艺术感染力;其三,前沿视效技术的加持固然重要,但需避免过度堆砌奇观,务求其与影片的情感深度及思想内核完美融合,实现相得益彰的效果。

唯有多样要素融合,中国军事题材电影方能爆发出磅礴的生命力,在全球语境下,以特有的视角与价值,开辟出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对话空间。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戏剧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抗战烽火中的“双萧合璧”

——萧军演讲稿《我们要怎样活下去呢?》初探

■ 陈子善

2008年6月,《萧军全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厚厚二十册,荟萃了著名作家萧军毕生的文学作品和日记、书信等,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部重要文献。

然而,“全集”不全,已成通例。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出版了两版《鲁迅全集》(1981年版和2005年版),至今仍有增补的空间。那么,《萧军全集》也不可能例外。《全集》失收的萧军演讲稿《我们要怎样活下去呢?》就是最新的一例。

据我所见,关于《我们要怎样活下去呢?》的记载,最初见之于萧军后来的夫人王德芬所撰《萧军简历年表》(发表于梁山丁主编,1990年10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初版《萧军纪念集》)。《萧军简历年表》1937年11月4日条如下:

“应汉口广播电台的邀请,讲了一次《我们要怎样活下去》。”^①

三十三年之后,闫桐、宋力军合著的《萧军传》(2023年5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初版)中,也采用了王德芬的这个说法:

“武汉时期的萧军,在《七月》上发表了《‘不是战胜,即是灭亡’》。(……)为纪念鲁迅先生,他还写了一篇《周年祭》在《七月》上发表。还以《我们要怎样活下去》为题,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说……”

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只知道萧军有过这么一次重要的演讲,至于这个演讲是什么内容,是否有讲稿存世?我们一概不知,只能凭借一个讲题加以推测。而今,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谜团终于解开了。

终于现身的萧军《我们要怎样活下去呢?》讲稿,钢笔书于“20×20”淡绿色字格对折的“七月社稿纸”之上,共12页(第12页仅四行字),字格上方中央标明页码,落款“一九三七,十,廿五日”。全文约四千五百余字,虽然每一页上都有一个别字或句的修改,总体而言是一气呵成。

1937年9月上旬,萧军、萧红夫妇自抗日烽火弥漫的上海来到同样抗日热情高涨的武汉,继续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该年9月11日,胡风主编的《七月》在武汉创刊,先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萧军和萧红各自为《七月》周刊和半月刊撰写了大量作品。萧军发表了《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伸出我们真诚的手臂》(王研石(公敬)君)《周年祭》《上海三日记》等诗文,萧红发表了《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火线外》《窗外》《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均以极大的热情为坚持抗战鼓与呼。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萧军于1937年10月4日在汉口广播电台发表了《我们要怎样活下去呢?》这篇演讲。在此之前,萧军已以“田军”的笔名在1937年9月18日《七月》第2期上发表了《“不是战胜,即是灭亡”》,强调只有抱着“抵抗到底”的决心,不断“发动民众”,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这篇演讲就是对此文观点的延伸和拓展。由于是通过广播电台向武汉各界市民演讲,演讲内容理应深入浅出,通俗

易懂,萧军的讲稿用浅显生动的语言回顾了人类的发展史,人类与动物的根本不同,然后过渡到中华民族为“活下去”,为活得有尊严,必须竭尽全力反抗日本侵略者,他的结论是振聋发聩的:

“我们每一个自己要活下去,并且要象个真正的‘人’似的在世界上活下去的中国人民,就只有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到底;要想使人类中弱于我们的,活得不如我们的也活下去,也象个‘人’似的活下去,也只有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到底;同样地,日本国内真正要想活下去的人民,或者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宰割下的弱小民族,也是只有盼望我们抗战到底。只有我们抗战胜利,才是他们真正活下去的门路。这抗战不独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活路,也就是整个人类每一个被迫害人的活路……如果有中途妥协的,他们不独是本民族的敌人,也就是整个人类的敌人,他和这损害人类真理的强盗,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同样的被我们所灭亡。”

萧军这个演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颇具宣传鼓动力,应该大大鼓舞了当时武汉广大听众的抗日斗志,在萧军武汉时期的众多作品中也独树一帜。特别令人惊喜的是,现存的萧军这篇演讲稿是抄稿的改定稿,抄稿者不是别人,正是萧红。

这篇讲稿第一页上的标题如下:

我们要怎样活下去呢?

——本月四日于汉口广播电台讲稿

这两行钢笔字与讲稿中的字迹有明显的差异,而与讲稿中数处修改的字迹相仿,即可推断,标题书写者和讲稿修改者是同一个人,即萧军本人。而讲稿抄录者另有其人,即萧红。这个结论有一个十分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讲稿第一页上,在署名者“萧军”的右边,有“萧红抄”三个字。这三个字又是另一笔迹,拙见这三个字出自首次披露这次演讲信息的王德芬的可能性最大。不妨再作如下的推断:萧军1937年10月4日在汉口广播电台演讲《我们要怎样活下去呢?》,10月25日萧红誊抄讲稿,再由萧军改定。有必要指出的是,萧红曾不止一次给萧军抄稿,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就是由萧红誊清的。萧军至少在《八月的乡村》1949年1月作家书屋三版《前记》和1954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后记》中,两次表示了感谢。这篇誊抄改定的演讲稿或有交当时某个刊物发表的打算,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未果,后来由王德芬补写了抄稿者的名字,终于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

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演讲稿《我们要怎样活下去呢?》是萧军和萧红合作的结晶。时光已经流逝了八十八个春秋,这篇凝聚了萧军萧红两人共同心血的演讲稿,弥足珍贵。

①《萧军简历年表》所列萧军演讲时间有误,应为1937年10月4日,详见本文分析。(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

借青年之梦,寻英雄之路

——评微短剧《归来方知山河重》

■ 李冬冬

当代青年在梦中与抗战英雄相遇,见证以热血浇灌信念之花的壮美人生,完成了一次跨越八十载的时空对话。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新华社新媒体中心携手腾讯和浙江大学未来影像实验室联合出品,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创作的微短剧《归来方知山河重》以9集的篇幅,通过当代大学生子涵的梦境,重现了那段浴血奋战的历史。

《归来方知山河重》用梦境巧妙地将历史真实与剧情创作融为一体,构建出一个既严谨又极具感染力的叙事空间。剧集精心选取了茅以升和工友们忍痛炸毁新建的钱塘江大桥、八女投江的壮烈牺牲、雁翎队痛击日寇的英勇无畏、新四军在刘庄顽强抗击日军的事迹壮举,以及黄珏在日寇扫荡时毅然跳崖牺牲等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核心内容,将子涵梦中的“在场”与历史事件相糅合,既遵循史实,又拓展了现代解读的空间。剧中的英雄形象呈现出多元化群体特征,从工程师茅以升到普通工人,从13岁的小战士到女指导员,英雄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担当。

《归来方知山河重》创新采用了“微短剧+纪录”的叙事模式,为微短剧创作探索了新的视角和审美范式。剧中历史照片等珍贵资料的引入,宛如一把打开抗战历史大门的钥匙,增强了艺术叙事的历史代入感。无论是钱塘江大桥,还是女英雄冷云的照片,都形塑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英勇抗战的不屈意志。观众通过这些珍贵资料,能够真切感受到历史现场的真实感和紧迫感。

在叙事方面,《归来方知山河重》巧妙地利用手机这一现代媒介,在现代青年与

抗战英雄之间构建起精神对话机制。子涵的角色代表了当代年轻人,他们与那段战争历史有着时空距离,但通过梦境,他得以“亲眼目睹”一个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亲身感受英雄们血肉与灵魂的温度。当他用手机记录下建设者们含泪爆破钱塘江大桥的悲壮瞬间,抓拍下抗联女战士沉入乌斯浑河的最后身影……这些细节设计将现代元素融入历史叙事,不仅再现了历史的真实,也象征着奋勇献身精神的传承。

《归来方知山河重》剧情紧凑,短小而不失历史的厚重感和情感的穿透力。尤其是在创作题材上的破圈尝试,对推动微短剧精品创作颇具现实意义。该剧摒弃和超越了以往只追求“爽感”的肤浅内容,没有依赖简单的情感刺激,而是深入历史的内核,抓住抗战精神的本质,使微短剧有了历史的厚度和精神的高度。在历史事件的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该剧也没有为了追求矛盾冲突而刻意制造夸张情节,而是让剧情自然流淌,让情感自然流露,让历史观照现实,展现了英雄精神的当代价值。剧中有一个震撼人心的场景:子涵带着跳崖牺牲的黄珏烈士来到2025年,让烈士看到了当今中国的面貌,实现了历史精神的现代性转化。观众通过一些细节,能够深刻感受到,今天历史的延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吾辈付出不懈的努力。

校园教室里,子涵的课堂汇报深深触动着同学们的心灵。《归来方知山河重》通过这场跨越八十载的时空对话,让我们看到了英雄精神的永恒光芒。

(作者系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长三角纪录片创作研究中心主任)



扫一扫,观看《归来方知山河重》

落花水面皆文章

——造园大家陈从周作品赏析

■ 周维强

陈从周先生,祖籍绍兴,1918年生于杭州,一代造园大家,博通文史,旁及乡邦掌故,精于书画,尤可说者,陈先生的造园论园之著述,亦是随笔妙品,比如冠名“说园”的5篇文章,原载《同济大学学报》,是论述造园之艺的论文,也是可作散文随笔欣赏的好文章。

陈从周先生的随笔作品,每于自然清丽的文笔,旁逸斜出真知灼见,启人心智。

梁思成,亦一代建筑大师。但陈先生内行看门道,《古为今用、古今结合的建筑大师》一文,更推崇杨廷宝:“近世建筑家能以古代做法运用于新式建筑者,当推杨廷宝。其设计式做法之纯熟,理解之透彻,细部及文样等之见广究深,虽梁思成自负著《清式营造则例》,不如也,梁氏整理之功,且为少作,尚多不周之处。其实践之学,瞠乎其后者矣……”有一说一,不容含糊。杨、梁均1901年生,杨为河南南阳人,梁则祖籍广东新会,二人均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苏锡园林为江南园林之代表,陈先生同中辨异,《苏锡园林风格迥异》一文有云:苏锡园林建筑风貌相异,近百年更为突出,“苏州乃地主与退休官僚寓居之地,其住宅园林皆属封闭性,外观简陋,内部则华丽精致,求一己之享受,不欲外人知之也。”无锡则不然,园林多为富商所有,“假建筑炫富,以达其营业之昌盛”。是故无锡富商之园林,“建筑外观讲究,墙垣门屋,水作装饰,木工雕刻,虽嫌庸俗,然皆工整为之,用此招揽。”无锡园林内部建筑,为迎宾接客考虑尤其周到。无锡荣氏,财富雄甲东南,而其住宅园林,荣巷之老宅“殊平平”,太湖梅园亦“未臻其善”。陈先生给出的解释是:“盖荣氏已走近代资本主义道路,不欲以大



陈从周作品精选(又称园林七书):《谈园录》《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随宜集》《世缘集》《梓室余墨》,燕山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量资金投于不动产,而以资金作再生产,视其前之资本家进步矣。此治近代我国经济发展史者应注意及之者。”这儿因以苏锡园林异同之辨析为主,却也语涉近代以来消费与投资观念之变化,陈先生视野不可谓不广矣。

《清代各个时期建筑均有不同特色》,寥寥数百字,于建筑透视时代之盛衰:当清初立至其鼎盛,建筑大木梁架之用料,清初犹仍明风;至乾嘉,“尤硕壮,比例大,屋顶坡度渐趋峻陡……”因“其时财力充沛之故也”。而到晚清,太平天国之后,“其于建筑外观屋高……更为峻陡,木架用料减小,尤以军工所建更为草率,今存南京、苏州等地斯时所建之衙署,皆可征信。反映当时之经济衰退面貌也”。

而对于乡村不经意之普通小桥的构建,陈先生亦不轻易放过。《乡村便桥为何只有一面栏杆?》一文里,陈先生对屡屡来询者给出的解说是:“首为便利挑担过桥之方便,无栏一边留有宽绰余地,便于周旋也。次则桥小两面用栏,耕牛不肯通行……”这解

释,估计教科书上不会有,亦非建筑之高深学问,但考察乡村建设,又不可不知也。这条材料,亦可见陈先生腹笥的广博。

陈从周先生出生于杭州城北青莎镇散花滩故居“爱吾庐”的左厢楼上,在杭州长大。陈先生所写随笔多有关于旧时杭州的掌故。

陈先生在5篇冠名“说园”的最后,写道:“园林言虚实,为学亦若是。余写《说园》,连续五章,虽洋洋万言,至此江郎才尽矣。半生湖海,踏遍名园,成此空论,亦自实中得之……”“踏遍名园”,陈先生的自负有理由:“实中得之”,这是陈先生的“夫子之道”。陈从周大学不是读的建筑学,肄业于之江大学外文系,后转入中国建筑学、园林艺术,非科班出身而造园成就斐然,全仰仗于个人的天分、兴趣、努力和“踏遍名园”,故他的学问可说是“实中得之”。陈先生的随笔赏析各地园林之胜,言之成理,谈言微中。杭州西湖杨公堤卧龙桥北的郭庄,今日已是一个精致的袖珍名园。可当初1982年陈先生初入郭庄,夕阳西下,“郭庄断垣残壁、鹅鸭成群,真有些不忍看”,曾经的名园沦落为了废园。陈先生在沪上《新民晚报》发表随笔《郭庄桥畔立斜阳》,为西湖边旧时园林“像郭庄这样的遭遇……呜冤叫屈”。

陈先生的呼吁起了作用,若干年后郭庄开始了修复,主持修复的是陈先生的学生。陈先生1990年7月写《西湖的背影》,其时郭庄正在修理,“几年不见已是卸尽残妆,还我初容……”陈先生自信修复后的郭庄,必当如他曾经教过的苏州网师园一样“名震世界”,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不游郭庄,未到西湖”。陈先生《西湖的背影》说“我自信眼未昏花,有选景择景的能力……”陈先生的“自信”今日已经成为现实。如今我们优游郭庄,庄内溪水 and 庄外西湖贯通,溪上小桥,湖石垒